

HUNAN

YOUXIKUSHEHUİKEXUE

ZHUUZO

HEHUIKEXUE

# 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陈代湘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 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陈来著  
周易出版社

湖南省优秀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

# 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陈代湘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莫金莲  
装帧设计:尹文君

## 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

陈代湘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3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125

字数:236,000

ISBN7-5438-3244-5  
B·79 定价:18.00 元

## 序

朱子学是现代新儒学的重要理论来源。在现代新儒家中，不论是接着朱子讲的新程朱派，还是判朱子为“别子为宗”的新陆王派，都十分重视对朱子学的研究。在他们看来，朱子哲学所涉及的基本问题，包括理气观、心性论和工夫论，也包括天人关系、内圣外王、知识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不仅是整个宋明理学都必须面对的问题，而且是一切时代，包括在今天也必须面对、必须回答的问题，实具有常理常道的意义。朱熹在当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虽然取得了重要成就，但毕竟有历史的局限性，在今天必须扬弃其过时的特殊表现形式，保留朱子哲学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中心观念，予以现代诠释，用来解决现代的问题。刘述先借用朱子的语言，把这叫做“理一分殊”。

现代新儒家之所以仍以“儒家”自称或自居，就是因为他们是自觉地承接孔子和宋儒之统绪，其理一也；而其所以为“新”，则在于其分殊表现形式已不同于孔子或宋儒，有了新的时代内涵。现在有人自称“儒学四期”，我们在鉴别真伪时就要看其学是否自觉地认同和继承孔门一贯之常理常道，其分殊表现形式体现了什么新的时代特点，对今天仍在发展中的现代新儒学是否有真正的超越，而这种超越仍在儒学的范围之内。

现代新儒学对朱子学的继承、改造和超越，因学派而异，因人而异，情况比较复杂。冯友兰的“新理学”是接着程朱理学讲的，但已针对时代需要而重新提出问题，并用西方的逻辑分析方

法对其进行了改造，因而具有了现代哲学的形态。钱穆系统地疏理了朱子庞大的思想体系，认为他已超越理学、心学之门户，成为孔子之后儒学的正宗和集大成者。牟宗三则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认为朱子不是宋明理学的正宗，而实为濂溪、横渠、明道之学的“歧出”，只能说是“别子为宗”。刘述先的《朱子哲学思想的发展与完成》一书总结了前辈新儒家的朱子学研究成果，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一分殊”的睿见。除此四人外，熊十力、贺麟、唐君毅、成中英、杜维明等新儒家学者也对朱子思想十分重视，发表过不少分析、研究、评论的文字。总之，理清现代新儒学对朱子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包括其内部的思想歧异与整合会通，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这项工作又是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学的需要，也是对朱子学的现代价值的一次重新认识，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思想史意义。因此，当陈代湘提出要以《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为题撰写博士论文时，我考虑到他过去曾著有《圣心苦雨——朱熹传》（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出版）一书，对朱子学已有一定的研究基础，如能再在现代新儒学上下扎实的工夫，是有可能对此问题获得较全面、清晰的认识的，于是同意了他的研究计划。经过三年刻苦攻读，他的博士论文完成后，作为国内外第一本研究此课题的专著，受到了评阅和答辩专家的较高评价，现在又将付梓出版，我自然感到十分高兴。

本书作者在仔细研读新儒家学者有关著作的基础上，发现他们对朱子学的重视程度，可以从中对所有核心问题都作了不同程度的研究这一点上充分反映出来，他们正是根据对这些问题的看法来衡定朱子的历史地位，并从中吸取建构自己的新儒学理论体系的思想资料。因此本书在写法上，就不是按人头逐个论列，分别对每个人的朱子学成果进行个案研究，作出得失评价，而是按照朱子哲学的内在逻辑结构，横向地深入研究新儒家学者对各主要问题的评述、阐扬和批导，客观地展示其学术立场、评价尺度

和诠释方法之间的差异，整体地把握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也揭明了前者不同于后者的“新”之实质所在。由于这个工作做得比较细致深入，因此本书中多有前人所未及的新观察、新识见、新评说，如指出现代新儒家“内圣开出新外王”的理论正是循着朱子的致思方向而提出来的，包括对朱子颇有讥评的牟宗三的“良知自我坎陷”说，也与朱子哲学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又如对知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格外予以关注，指出朱子重视知识性的“外王”是他区别于其他理学家的鲜明特征，现代新儒家中的“道问学”一系即由此开出，它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整合知识与价值的作用；还有对朱子学中宇宙论和人生论并重，为什么到“接着讲”的现代新儒学中却人生论突显而宇宙论衰微之原因所作的探讨，试图以人类的本质和人类整体的功利为标准来重新诠释、评价儒家的人性善恶理论等等，都富有新意，有作者深造自得的体会，故能给人以诸多启发。本书涉及的问题和人物很多，作者在系统阅读、认真思考的基础上，大体上能把握各主要问题及其内在关联，对各家观点作出比较平实的评述和客观的评价，为理清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的关系打下了初步的基础。

本书在重点探讨现代新儒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之同时，也对儒学的本质特征、用世功能、现代命运、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了宏观的思考，如对儒学的“世界性特征”的揭示，主张从形上超越、政治伦理、日用习俗三个层面来分别阐明儒学中的“尊德性”派和“道问学”派在未来社会所可能起的作用等等，都有独到见地，表现了作者深切的人文关怀。但有些看法还是可以讨论的，如在说明儒学的“世界性特征”时，引用了冯友兰先生认为“中国哲学不合于救中国，它却足以救世界而有余”，“因为它是为了世界组织而有的哲学”的一段话，而在论证这一观点时，却主要是说儒学“难与进取，可与守成”，它“是治世安民之术，而非乱世争斗之法”，这是讲儒学的守成性，面对并非只有和平

稳定而没有争斗的世界的局限性，并不能说明它因此而有了“世界性特征”。生长在中国的儒学如果不能救中国，它真的能够救远比中国的事情复杂得多的世界吗？我认为可以说儒学是一种有救世情怀的哲学，但至今还不能证明它“足以救世界而有余”。有关对儒学和现代新儒学的评价，书中还有一些提法，与我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但是应该允许不同意见存在，尊重每个人独立思考，在相互切磋中学术才能得到发展。

中国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今天已没有十年前那样的热闹，但却需要对一些重要问题作冷静的深入研究，提高整体认识水平；同时关注现代新儒学的新近发展态势，把它作为思考中国文化发展问题的一个重要参照。代湘此书就是这方面的一本力作，希望它能引起学术界对现代新儒学的继续重视和研究兴趣。

方克立

2002年10月5日

## 前　　言

20世纪20年代初，在儒学遭到空前“厄运”之际，年仅28岁的梁漱溟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横空出世，宣称要出头倡导孔子之真，标志着现代新儒家学派的诞生。经过迄今三代学人八十余年的努力和发展，现代新儒学已成为中国现代三大主流思潮之一，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由于其学术薪火不断传递，以及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面向未来的岁月，它仍然表现出一定的生命力。

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有着直接的理论承继性。宋明理学家探讨的问题非常广，宇宙自然、人生社会、政治礼制……无不在其视域之内。现代新儒家接过宋明理学家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注入了新的内容，为儒学的重建及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现代化做出了一定的贡献。现代新儒学内部亦有“理学”与“心学”的分野。宗程朱者其理论来源与朱子的关系自不待言。即便是抑朱贬朱者，也因朱子“注遍群经，讲遍各家”，从而“虽不能以之为标准，实不能不以之为中心（焦点）”（牟宗三语）。本书旨在以朱子为中心，以问题为线索，追溯现代新儒学的理论渊源，重点研究现代新儒家对朱子哲学思想的继承和超越，评判其得失，探讨朱子学乃至整个儒学的现代意义和未来走向。

现代新儒家中的冯友兰、钱穆、牟宗三、刘述先四位学者都对朱子学进行过集中的研究，写出过有关朱子学的专门著作，同时，他们自己的新儒学理论也受到朱子学的深刻影响。因此，本

书即以这四位学者为中心。但也不受局限，其他新儒家学者的相关论述，也在本书的视野之内。总之，本书的论域是以冯、钱、牟、刘为中心，而兼采其他新儒家学者的观点。

本书分上下两篇：上篇总论，下篇分论。两篇密切相关，但又各有其相对独立的任务和目标。总论部分主要探讨三个大问题，一是现代新儒学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内在理论根据，二是考察现代新儒家对朱子学的研究，三是分析现代新儒学对朱子学的继承和超越。可以看出，现代新儒家既是朱子学的研究者，又是朱子理论的继承和改造者。总论以现代的眼光，从宏观的角度探究现代新儒家和朱子所共同关注和研究过，我们今天仍在讨论，仍然有现实价值的几个大问题。分论部分不是按人头来逐个论述，而是按哲学的主要问题来进行微观的研究。分论注意点面结合，既照顾到某一位新儒家学者对某一个问题的集中论述和突出贡献，又同时注意别的学者对此问题的分析和阐述。

结语部分是本书的逻辑终点，其中包含许多我自己对朱子学及整个儒家哲学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的思考，肯定有不成熟的地方，冒昧地陈述出来，以求教于方家宿儒。

## 目 录

序.....	( 1 )
前言.....	( 1 )

## 上篇 总论

<b>第一章 儒学的现代命运及现代新儒学的产生.....</b>	<b>( 3 )</b>
一、儒学的“世界性”和“入世性”及其现代命运 .....	( 3 )
二、现代新儒学产生的时代与理论背景.....	( 21 )
三、现代新儒学的定位 ——兼及儒学的分期.....	( 45 )
<b>第二章 现代新儒家的朱子学研究.....</b>	<b>( 50 )</b>
一、朱子的历史地位 ——集大成与别子为宗.....	( 51 )
二、现代新儒家对朱子学主要问题的看法.....	( 72 )
<b>第三章 现代新儒学对朱子学的继承和超越.....</b>	<b>( 84 )</b>
一、宇宙与人生.....	( 84 )
二、内圣外王与民主科学.....	( 92 )
三、知识与道德.....	( 113 )

## 下篇 分论

### 第四章 理气论

——现代新儒家对朱子宇宙本体论的探讨与继承、改造	(131)
一、理、气与形上、形下	(132)
二、“存有”与“活动”	(146)
三、理一分殊	(154)

### 第五章 心性论

——现代新儒学的心性本体论与朱子学的关系	(163)
一、心、性、理	(164)
二、心体、性体与道德的形上学	(175)
三、善、恶与义理之性、气质之性	(197)

### 第六章 方法论

——从朱子学的工夫论到现代新儒学的方法论	(216)
一、格物穷理与逆觉体证	(216)
二、正的方法与负的方法	(229)
三、直觉与理智	(246)

结语	(255)
一、朱子学与儒学的现代重建	(255)
二、儒学在未来社会中的作用	(272)

主要参考书目	(299)
--------	-------

后记	(308)
----	-------

# **上篇 总论**



# 第一章

## 儒学的现代命运及现代新儒学的产生

孔子身后，儒学与世偕行，载浮载沉。无论是笼罩在显赫的光环下，还是被弃置于孤寂的角隅里，它皆因势成形，以各种面目深入中国传统社会的各个领域，成了中国人至今挥之不去、斩之难断的文化情结。近代以来，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劲冲击，儒学的命运多灾多难，悲喜交集。想当年凄处举国上下“打倒孔家店”的怒潮中，儒门岂止“淡薄”，简直要被切断命脉。

儒学在近现代遭遇到的困境，既是西方文化涌入而导致的外在冲击使然，又与儒学自身的性质有关。现代新儒家以重建儒学为中心课题，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时代和理论背景。

### 一、儒学的“世界性”和“人世性”及其现代命运

#### （一）儒学的“世界性”特征及其现代命运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古老中华帝国的迷梦被击碎，中国封建社会已呈解体趋势。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思想儒学也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尽管先有洋务派和早期改良派企图通过改造儒学以达到儒学的自救，然而由于他们骨子里固存着中体西用、道本器末的“天朝上国”情结，最终还是难逃破产的命运；后又有现代新儒家诸贤为恢复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而呕心

沥血，奔走呼号，但他们的文化心态仍难脱“中体西用”的窠臼，故依旧难成回春妙手。

儒学在近现代因遭遇到西方文化的冲击而衰落。而儒学发展的历史也表明，它的兴衰浮沉始终与社会的治乱安危密切相关。当天下统一，社会繁荣稳定，人心思治之时，儒学就受到极大关注，甚至以独尊的态势得到长足发展；而每当天下大乱，社会动荡衰败，群雄逐鹿之际，儒学也随之遭殃，被弃置一旁。这一现象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儒学到底是一种在什么范围内适用的学说？

关于这个问题，冯友兰先生说过一段极富启示性的话。他说：“去年春天著者在重庆时，听见一句话，说：‘中国哲学不合于救中国，它却足以救世界而有余。’这实在是一个聪明的见解，虽然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但是我绝对相信这句话。中国哲学不适于救中国，因为它是为了世界组织而有的哲学。”<sup>①</sup> 这段话虽然说得有点绝对，比如说中国哲学不适于救中国，而事实上他自己当年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中创立新理学体系时，目的就是“想把中国传统哲学恢复起来，激发人们的爱国思想，抵制日本的侵略”<sup>②</sup>。又如说中国哲学足以救世界而有余，未免过于自信。但是，这段话却向人们揭示了以儒学为主的中国哲学的世界性特征。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是一种有世界情怀的哲学。儒学，从它形成之初，就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构建自己的治世理念。现在我们所说的“世界”，也就是当时中国人所谓的“天下”（古代交通不发达，信息不灵通，古人的地理知识自然不如今人完备，中国古代所谓“天下”，指的是中原加上“四夷”，地理概念

---

<sup>①</sup> 原载《文华》第2期，见《中国哲学的精神·冯友兰文选》，第249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2月版。

<sup>②</sup> 冯友兰：《四十年回顾》。转引自许全兴等著《中国现代哲学史》，第39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5月版。

不同于今天所谓的七大洲、四大洋)。儒学的世界性特征使它超越了一邦一国的拘泥，从而只有当“天下”和平稳定，基本达成共识而无冲突时，才有奇效；而当“天下”动乱不宁，邦国冲突对抗时，它便救世乏力，显得十分迂腐。所以说儒学是一种世界性的哲学，是治世安民之术，而非乱世争斗之法。

### 1. 儒学起点的“天下”意识

王国维在谈到我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源流时，说：“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sup>①</sup>这一番言论，是很有见地的。揭示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儒学和道家学说的差异。冷性遁世的道家学派，他们更多地关心个人身心的安顿；与之相反，热性入世的儒家学派，他们则把关注的焦点放在国家天下的治理上。因此，儒学理论的起点就被置于治理天下的高度上，一切都起始于此，环绕于此，最终又要落实于此。四书中的《大学》首章即云：“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君子理想的人生道路，体现为一从内到外的动态流程。在这一流程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主要是个人内在的一种知识追求和道德修养，是一般人不必借助外部条件也可以做到的。“齐家”虽只涉及自己的家庭，但在以家

<sup>①</sup> 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见《王国维文学美学论著集》，第30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87年4月版。